

女性主义哲学思潮对女性体育观的影响

关景媛¹, 陶玉晶²

(1.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体育文化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24; 2.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依据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中 3 类颇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哲学观点, 结合女性社会角色、身体观念、自我认同的转变历程, 对女性体育发展的阶段特征及所蕴含的“政治运动-思想观念-文化载体”交互关系进行解析。研究认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女性体育发展以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为思想武器, 实现了女性体育权利意识的启蒙, 但理论上存在认知局限性, 实践上欠缺彻底性与集体性;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女性体育借助激进的女权潮流, 把女性体育作为破除性(性别)制度的权力场域, 致力于消灭差异和生理超越, 虽客观上取得长足进步, 但理论上陷入本质主义, 实践上存在体育伦理意义上的僭越与隐患; 20 世纪末, 生态女性主义的反思给予异化发展的女性体育以警醒和可能出路, 建议按照道法自然、尊重差异、合度开发的基本原则发展女性体育。因此, 女性体育观的变化与女性主义哲学思潮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践具有一致的阶段特征和鲜明的时代性, 是人类社会“政治运动-思想观念-文化载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的反映, 是特定历史阶段政治/文化观念交互作用和权力/制度力量博弈的产物。

关 键 词: 体育哲学; 女性体育观; 女性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6)04-0018-07

The influence of feminist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female sports view

GUAN Jing-yuan¹, TAO Yu-jing²

(1. Research Center of Sport Culture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3 types of quite representative feminist philosophical views in feminist philosophical thoughts, coupled with the course of transformation of females' social role, body conception and self identification,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stag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sports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ontaine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movement and ideology and cultural carrier”,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between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emale sports development realized the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sports right awareness by using liberalistic feminism as its ideological weapon, but there were recognition limitations theoretically, and the lack of thoroughness and collectivity practically; between the 1960s and the 1970s, with the help of radical feminist trend, female sports devoted itself to eliminating differences and physiological exceeding by using female sports as a power field to break the sex/gender system, although it made great progress objectively, but it fell into essentialism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ere were arrogation and hidden dangers in terms of sports ethics; in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eflection of ecofeminism gave dissimilarly developing female sports warnings and possible ways out, proposed to develop female sports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following natural laws, respecting differences and developing appropriately. Therefore, the changing of female sports view and the practice of feministic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the female liberation movement have consistent stag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inct time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reflection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movement and ideology and

收稿日期: 2015-09-23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5-541); 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 2015 年度高教科研重点课题(JGJX2015B3)。

作者简介: 关景媛(1985-), 女,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体育哲学、女性体育。E-mail: guanji727@nenu.edu.cn 通讯作者: 陶玉晶教授

cultural carrier”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product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ceptions and the gaming between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forces at particular historical stages.

Key words: sports philosophy; female sports view; feminist philosophy

女权革命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分别是女性解放与发展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武器,而体育在女性总体的启蒙与解放事业和女性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女性体育活动是女性身心协调、平衡发展的有效实践,女性体育观则影响女性体育认知与参与、女性社会角色、身体感知与自我认同、社会与个人价值取向等行为与观念选择,换言之,女性体育的发展深受社会主流女性体育观念的导引,女性主义哲学思潮的争鸣与思想是女性体育观念的思想源头。根据不同流派①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针对靶向与奋斗目标,分拣整合出3种女性主义哲学理论: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激进主义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理论,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六七十年代、20世纪末期3个女性体育发展的典型时期进行多维考察,反思女权运动、女性主义哲学思想在体育领域的变革与实践,讨论影响女性体育观形成与转变的思想根源与动力及其历史价值与局限性。

1 从缺位到觉醒——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女性体育权利意识的启蒙

1.1 奥林匹克运动的时代性过失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在1912年《奥林匹克评论》中奠定现代奥林匹克的基本意义框架:“以国际主义为基础、以忠诚为手段、以艺术为环境、以女性的喝彩为奖赏的庄严、周期性的男性体育精神的展示。”^[1]。这一框架在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宣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同时却也犯下时代性过失——把女性拒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大门外,客观上剥夺了女性参与公众体育运动的权利。1896年第1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奥委会严格继承古希腊传统,坚决禁止女子参赛。这一时代性过失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首先,是受到生育功能所决定的女性传统价值影响。在古希腊200多个城邦中,斯巴达的妇女享有更宽松的体育政策,可以有参与体育训练的机会,但要求女性参与锻炼的目的却是为使女性具有强壮的体格,以生育健康公民与合格的战士,女性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而非独立“人”的存在。顾拜旦仍认为女人的荣耀来自她生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在体育方面,她最大的贡献是鼓励她的儿子创出佳绩,而不是自己去破记录;第二,是封建道德观念的阻碍。“古希腊人不允许女人进入他们的体操馆和体育场。

换言之,任何女性都不得涉足那些专门用来对男子进行教育的场所——甚至在那些全国性节日的大型运动会上,女人也不得作为观众前往参加”^[2],在古代奥运会上男性运动员都赤身裸体进行竞技运动,认为女性出现在这种场合是有伤风化的;第三,是男权中心的性别文化制度的集中反映。“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基本上是一段男性霸权的历史”^[3],不论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还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初期,女性都是沉默的“他者”,既没有参赛资格,也没有观看权利,“她们的作用应同古代奥运会一样,是为优胜者戴上花环”。男性以女性存在先天生理缺陷以及无权涉足公共领域为由,将其长期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顾拜旦曾在1920年强烈要求将女性驱逐出奥运会赛场;1925年再一次提出“女性参加奥运会的行为是不合法的”^[4]。

1.2 女性本应拥有选择自己身体活动形式的权利

18世纪起,受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发展起来,“现代政治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联系最密切的目标之一就是机会均等”^[5],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坚持人性的概念,认为作为人的独特性在于“理性能力”,对于理性能力的界定或者强调它的道德,或者强调它的审慎。当理性被界定为理解道德的理性原则能力时,那么个人自主的价值就得到强调;当理性被界定为达到某些欲望目的的最好手段时,那么自我实现的价值就得到强调。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革命者们秉持“权利高于善”的信念,以创造“一个公平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7]为目标,试图通过改良制度,即铲除在教育、法律和经济政策上的社会性别歧视,使得人们(尤其是女性群体)有自由选择活动形式实践人的基本权利,进而达到社会性别平等。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8]56}就曾犀利地针砭“这些妇女像鸟儿一样被限制在笼子里生活……是‘被圈养’起来的妇女”,“因为不允许他们到户外活动,以免晒黑女人雪白的肌肤,所以她们的身体不健康。因为不允许(妇女)自己做决定,她们没自由”^{[9]17}。并认为这种自由缺失的生活境遇会阻碍女性理性能力和独立人格的发展,进而阻碍女性“成为对社会福祉作出重要贡献的人”^{[8]52},毕竟“除非人的行动是自主的,否则他或她都不是作为充分的人在行动”^[10],因此要求“妇女成为自主的、能自己做出决定的人”,实质“呈现出一幅妇女在精神和身体上自强的图景”^{[9]19}。女人

不仅仅是为成全他人幸福和完美的“手段”，相反，女人是“目的”，是理性的主体，她的尊严包括有自我决定的能力^{[10]63-64}。解决性别不平等有效途径是使女性也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当然也包括体育。社会性别公正必须给女性提供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和机会，女性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女性拥有为自己做决定的自由，女性能够运用理性能力去实现自我，社会应当提供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女性本应拥有选择自己身体活动形式的权利，且这种身体活动形式如果是参与公共体育运动与竞技理应得到社会的公认。

1.3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体育观及其实践

女性主义者以看重公正、机会均等、选择自由为其争取体育权利的基本主张，他们反对强调性别在机会和自由选择问题上的差异，反对以性(性别)差异制度为标准的一切男权文化意识和法律规范，并试图依靠女性群体内部个人的努力来争取女性的体育权利。

女性能够合法进入奥运会的历程是艰辛且曲折的，且存在偶然性。女性在早期现代奥运会始终是非法定、表演性、附着性的存在样态。从参与的项目上看，1900年第2届现代奥运会上的女子网球、女子高尔夫球是作为巴黎世博会的附带项目被列入比赛的；1904年第3届奥运会上的女子射箭是作为非正式比赛项目设置的，女性比赛项目均是消遣和点缀的活动。从参与的人数看，前几届女运动员人数为19、8、36名，在全体运动员中所占比例始终不足2%，且不具备合法的参赛资格。从所设置项目特点看，存在明显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男性中心话语的控制：花样滑冰、网球、体操、游泳等符合“女性气质”、“具有美感”的项目可以列入比赛，而需要极强爆发力和攻击性的项目，如田径等被排除在外。

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潮和政治运动影响下，法国妇女阿里斯·朱丽阿特第一个提出组织妇女自己的体育运动会并成立妇女体育协会，公开与奥运会分庭抗礼。此后，国际妇女体育联合会于1922、1926、1930、1934年分别在法国巴黎、瑞典哥德堡、捷克布拉格、英国伦敦组织了4届世界妇女运动会，参加的国家达到19个，最后一届观众就达数万人^{[11]6}。

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体育观及其实践呈现4个特征：首先，强调男女权利和机会平等，主张应使女性在各个层级的运动参与中获得与男性同样的运动机会；第二，意识到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作用，试图通过“立法”增加女性参与运动的机会；第三，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尝试清除女性参与体育竞技活动的障碍，包括观念、习俗、制度乃至阶级；第四，从竞赛参与、比赛项目设置、参赛人数与规模等方面，致力于消除

体育运动中的性别歧视。

经过曲折的努力，终于结束只有男性参加奥运的状况，虽然受到性别刻板印象和男权主义的束缚与压制只能参加展现女性柔美气质的项目，但无疑是实现了女性体育参与质的突破，是女性体育权利意识觉醒的明确表达。当然，也暴露出对女性受压迫根源的认知局限和革命实践策略的局限，如对两性不平等的反抗策略中，暗含女性在理性与道德发展上有欠缺的前提假设且忽视女性品质的特有价值，在实践中，忽略女性群体的不利地位和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2 从反抗到突进——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对女性体育参与观念的颠覆

2.1 “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成为女性体育发展的羁绊

自19世纪起，女性(主要指贵族女性)在体育方面就不断向更多运动项目渗透。出现女体育教师培训学校、汉普斯特德女子体育和体操学院等一些有代表性的女子体育机构。同时涌现出马丁娜·厄斯特贝格(Martina Bergman-Österberg)^②、肯考迪娅·勒夫温(Concordia Löfving)^③等女子体育教育家和实践者。19世纪妇女在体育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出现职业黑人女子棒球队，女子也陆续参加到划船、游泳、行走、草地网球、网球、田径、射击、骑射、自行车、剑术、冰球、长曲棍球、旱冰、滑冰、高尔夫、槌球、足球等项目之中，且成立俱乐部和协会，形成有组织的女性体育社会群体^{[12]271-273}。

然而，伴随女性更广泛参与体育运动，产生一系列的疑问和争论。什么样特质的运动适合女性参与？所谓女性天生柔弱的“女性气质”是否构成其体育参与的限度？女性是否有能力从事跟男性一样规则和强度的体育运动和竞技？与男性的生理差别对女性体育参与是诅咒还是福利？比如，20世纪20年代公开举办女子比赛尚属有风险之事，因为这会被人看作闹剧(Freak-Show)^[13]；1921年12月当英国大约150个女子足球协会合并成立为一个联合会时，英国足协禁止妇女们继续在其球场踢球，据说是为保护妇女不受健康损害^[12]。医生唐纳德·沃克虽然坚决反对女子体弱不适合运动的观点，并强烈建议女子为保持健康和俊美而运动，但主张要有度，并非任何运动都适合天生柔弱的女子，特别是骑马这一项目怀疑会让女人下体变形^{[12]270}。帕克斯^[14]曾反对过类似的论断：“认为只有某些特定的游戏和身体锻炼适合女性从事，是对个人权利的无聊限制。”1932年在法兰克福洛特·施佩希特组建第一家女子足球俱乐部，她的动机除了喜欢足球外，“也为了展示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一样能行”，媒体

嘲笑她们是“牝鸡司晨”，1936年德国足球总会(DFB)正式宣布：足球与女子本性不相容^{[12]304}。类似的冲突实不鲜见，其背后的驱动力实质是不同立场的拥趸对于性(社会性别)制度④的认同与拒斥。

2.2 女性体育参与成为反抗“性/社会性别制度”压迫的表征

激进女性主义群体，内部分为“激进-自由派”和“激进-文化派”^{[9]69}，⑤最显著立场是强调“性/社会性别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9]68-72}。⑥她们中一些人关注到“正是女性气质的概念以及妇女的生育、性角色和责任，常常被用以限制妇女作为完整的人的发展……她们尤其渴望雌雄同体气质”^{[9]69}。其中表达激进女性主义者“敢于表现男性气质同时也表现女性气质，超越性/社会性别制度的限制”^{[15]445}的最初愿望；也有一些人却拒绝把雌雄同体的观念作为值得追求的目标，认为最好是成为女性的(女性气质的)人，这比成为男性的(男性气质的)人要好，妇女不应该努力像男人一样^{[9]70}。尽管存在着分歧，但是人们注意到“性/社会性别差异与其说是出自生物原因，不如说是出自‘社会化’过程，或者说是‘出自作为女人在父权制社会存在的整个历史’。”^{[15]440}实质上，是点明“性别就是阶级”，性/社会性别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女人”的主要敌人是“男人”而不是体制。

米利特认为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夸大了男女之间生物学上的差异，这种意识形态导致女人想在父权制社会生存，她最好表现出有“女人气”的行为举止，否则就可能遭受形形色色的残酷和野蛮对待。然而许多妇女都用行动证明她们是不可控制的。戴利力主女性拒绝成为他者，她作为理想提出出来的是“野性的女性”——一种超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存在。总而言之，激进女性主义者从不同角度构建途径以达成革命终极目标——在一个雌雄同体的社会，完全消灭性的差异^{[9]103}。因而在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激励下，女性广泛而深刻地参与体育锻炼和竞技，成为女性群体反思“社会性别制度”有力的实践表征。

2.3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体育观及其实践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实际上针对的是在女性群体体育意识受到启蒙并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体育参与的合法权益和平等机会后，要想进一步冲破性别刻板印象的限制，反对男性以先天生育角色分配以及据此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别制度为由，践踏女性的自由选择权，甚至用“女性气质”对女性群体进行文化规训和舆论压迫，如体育比赛中“男性化”的项目对女性的驱逐，甚至嘲讽。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体育观有3个特征：第一，批判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主张消除性别气质之

间的差异。认为运动可以使女性发展成为更加完善的个体，运动是性别气质建构的重要场所；第二，主张女人应当克服自己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男性气质，其中包括攻击性和独立性，客观上有利于抵抗性别制度的压迫，且有利于构建“雌雄同体”的理想社会，实现对女性天然生理局限的超越；第三，纵然存在思路上的分歧但核心目标是消灭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破除性(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群体在体育领域的宰制。

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女性主义者们也汲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经验，改变依靠个人努力争取权利的思路和局面，广泛发动女性群体，发挥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创造女子体育成就，因为最能促进人们认可女子体育运动的是其有目共睹的体育成就^{[12]308}。其一，女性运动员比例逐渐增长。以冬奥会为例，1924年夏蒙尼冬奥会女男比例为13:245(5%)，1956年科尔蒂纳冬奥会女男比例为132:689(16.1%)，到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比例变为274:998(21.5%)^{[12]308}。其二，女子体育项目不断扩充，且从项目所需身体能力的角度看，女子项目有向男性化发展倾向。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在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思潮作用下，随着科技革命和政治运动的发展，女子几乎全面参与体育比赛的各类项目，并且运动成绩也不断接近男性水平，一些项目的女性运动员通过严苛的训练也具有男性气质和肌肉线条，对于女性美的公众认知也变得多元而包容。客观上，女性体育观的变化与女性对社会性别差异制度的反抗形成双向触动，使女性体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然而由于激进主义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在理解两性差异及其阶级压迫问题时总难免落入僵化的本质主义圈套，她们不希望他人用本质主义看待自己和其他受压迫群体，她们却正以本质主义看待他人^[16]。

3 从宰制到尊重——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体育本质的复归

3.1 后现代社会文化对女性运动员构成更为复杂的宰制力量

瓦尔·普兰姆伍德曾说：“女性在抛弃其自然性之后，所获得的并不是真正的解放，而是成为男性控制自然和支配自然的伙伴。”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看到运动场上因为长期投掷训练而身材魁梧的女选手时，也不禁感叹：“我想，奥运会中的女子可以参加适合她们的运动，如游泳、网球和击剑等，但绝不是铅球！”这似乎落入历史的钟摆效应之中，这些观点虽是基于外观的提醒，而事实上男性化的训练强度和标准、功利化的提高成绩的做法，包括使用雄性激素、

兴奋剂、紫外光灯裸体照射训练^[17]等对女运动员的身心伤害更甚于男性。

在文化多元发展和信息爆炸性增长的背景下,媒体和社会亚文化把曾处于隐匿态的私己问题曝晒于公众视界,例如,格外成功的女足运动员是否更加“非女性化”或者是女同性恋者^{[12]389}。因为女足运动员通过从事一项男人占主导地位的职业而打破性别界限,身体、性与运动这种联想常会在媒体中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被媒体渲染成了“假小子”,当然这也可以被归结为“厌恶女同性恋症”。这为女运动员提出新问题:在公众视野和公共空间如何展示自己是恰到好处的。此外,对于性别的认知也在不断产生新的刺激,有人提出性别光谱假说,认为仅仅包含男性及女性的“双性世界”已经面临挑战,男、女的简单分类早已不再适用,“双性世界”的霸权行将崩毁,多元性别的发展已然铺展开来^[18],例如,南非女性中长跑选手卡斯特尔·塞门亚(Caster Semenya)由于800米成绩卓越遭到服用兴奋剂和性别为男的质疑。国际田联(IAAF)安排她做性别检查,结果证明她可以继续参加女子组比赛,但国际田联秘书长的一句“她当然是个女人,尽管不是100%的。”^{[12]390}再次引起轰动。毕竟体育运动中的性别分类若是暧昧,那就意味着丑闻。由此可见,双性化打破了自然世界秩序的稳定性^[19]。体育伴随生物技术、医学、科技的发展,似乎已然走向了异化,人们在开发潜能、挑战极限的时候集体无意识地抛却了自然的法则。人类从自然中赢得的控制越多,他们在肉体上和心理上就越是与自然分离。

3.2 尊重他者、正视差异是当今体育运动科学发展的前提

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认为:“当事情是趋向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所有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生态系统不是别的,它正是‘自然’;而道德成为自觉的(或思想着的)人保护自然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感的实质。”^{[19]368-369}生态女性主义借鉴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认为(男性权力/制度)对妇女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一方的解放不能脱离另一方的解放^[20];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视角,生态问题的解决也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虽然在生态女性主义中包含有文化生态女性主义、⑥社会生态女性主义、⑦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⑧等分支,但大多认同萨勒的这个基本论点:“对妇女的仇恨本身导致对自然的仇恨,因此这是支配男人(男性)的行动和支配西方/父权制文化整体的原则性机制。”^[21]换言之,女性

与自然对于人类而言同样意味着孕育与承载,而男性出于生存本能,视女性与自然为资源,既是资源,就自带被开发、被使用、被抢占、被改造、被规划、被统治的性质,资源的非先在归属性、差异性和有限性是这些被动属性的源头,也是造成男性群体内部权力纷争的致因之一,因而两性的“仇恨”与人类与他者的“仇恨”具有极为相似的文化心理机制,反之,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制度对于女性群体的压迫和不公正的对待,与人类对自然系统的破坏和对自然法则的践踏,是人类意欲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重要关联性问题。

承认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认可女性在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纽带作用,为女性主义提出3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其一,通过把女性融进人类整体的文化与生产领域,来把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生育);其二,重申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提出女性的天性不仅有别于男性,甚至(女性文化在某些方面或一定程度上可能)优于男性文化;其三,不要通过简单地把女性文化加入男性文化阵营满足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而是争取利用女性内在优势创造一个不同以往、能把直觉、精神和理性的认知形式结合为一体的文化与政治形态,进而创造自由、生态和谐的社会^[22]。

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也遵循这个发展规律,首先体育不专属于男性或者女性,不能简单归于是男性气质或是女性气质的实践活动,二者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共同融入;第二,承认差异,正视女性的天性有别于男性这一事实,并且放弃执着于绝对的、同样的平等,转为追求差异化的平等;第三,在性别问题上,尤其在性别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告别冲突、告别针对、告别革命,应认识到人类已经到寻求和谐发展的时代。

3.3 生态主义女性主义体育观及其展望

生态主义的女性主义隐含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信仰,◎即人类所有的压迫形式归根结底都是出自那些二分性的概念构想,它赋予双方中的某一方有优于另一方的特权^{[8]372}。因此,为避免妇女抛弃其自在的领域、内在性的世界而获得不是真实个性的发展,导致仅仅是有“机会”成为男人的充分伴侣参与到控制和支配自然的战役里,就应该致力于消除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促进二者的弥合,从“追求同样的平等”转为“追求差异中的平等”,正确认知男女两性的差异及其互补的可能性,进而形成和谐的整体。

据此生态女性主义体育观应把握的原则:首先,道法自然。即明确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是密切的,自然有阴阳之道,互补相生,共荣共生,因而女性与男性在体育发展中都有自身的存在方式、价值与合理性,

体育的任何一种形式其终极目的都是人的发展，而不是压迫人、改造人、使人异化，因此在运动中否定生理性别差异和消灭社会性别特质的观念是对自然法则和规律的僭越；第二，尊重差异。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在对事物本质的认知过程中有其合理及重要贡献，在性别的认识上，二元分立无论是逻辑还是行动上都具有实效性，但二元分立不同于二元对立，矛盾是存在的但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在体育发展过程中，忽视甚至否定两性差异，尤其为绝对平等而无视女性独特性，按照男性标准对女性身体能力过度开发，只能导致对女性身体的摧残和更大程度的剥削；第三，合度开发。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体育项目的开发和运动潜能挖掘，都要以科学为依据进行理性考量和分寸拿捏，对女性而言在任何项目中都同男性展开同等的竞争，必然会将女性引入过度训练和超负荷竞技的深渊，包括以体育为形式发展人的认知能力与社会性方面，如若忽视规则、缺乏理性，更会导致性别角色偏差、自我认同畸形、社会交往障碍等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发现第23届奥运会上首次出现只允许女子参加的体育项目——花样游泳和艺术体操，既体现对女性特质的考量，又回归体育运动的本质，即合理发展人的天赋潜质，使人获得愉悦的身体体验，促进道德完善及社会良好发展。

研究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沃斯通克拉夫特、泰勒、穆勒等先锋的倡导下，唤醒部分女性群体站位于自由，以公平的名义挑战男性中心制度，初步实现女性体育“权利”与“机会”的两性平等，但由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主张借用古典自由主义的论说，而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仍然是男性中心话语的表达，因而，在理论上的寄居造成其对两性不平等文化、经济、政治制度根源认识具有一定局限性，而这种革命理论的依附性生成方式也决定了革命实践缺少力量和组织，可以说男权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体系合力对女性体育争取平权的革命形成围困，致使这一时期女性体育的发展缓慢而曲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奥运会女子项目陆续出现剧烈身体对抗倾向，且突破中长跑项目和挑战人类体能极限的铁人三项运动对女性的壁垒，这得益于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对于“性别阶级”的批判，使得重新审视传统的女性身体观成为可能，实现女性体育观念和女性体育权利从制度层面向身体层面的渗透，但理论上却受到激进女性主义认识的影响对于性的阶级差异根源的认知陷入本质主义论争，导致实践上存在体育伦理意义僭越与多重隐患——企图

建立一个雌雄同体、完全消灭性差异的体育人文环境，女性和女性体育在这场革命中都被不同程度地异化了；20世纪末期，在对女性运动员的身体和境遇的关照中，受苏珊·格里芬等学者理论的影响，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宇宙间的自然规律，成为对激进主义女性体育观的反思路径，受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影响，女性体育观从“追求同样的平等”逐渐转为“追求差异中的平等”，这是在激进革命后的理性沉淀，也是对女性社会性别角色、身体观念、自我认同的再思考，更是对女性体育异化发展的纠偏，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体育的反思和救赎并不是女性体育观念史的结语，而更像是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最小伤害、最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一种观念选择和实践导向，当这种平衡被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形态所打破之时，女性体育观念亦将随之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女性体育观的变化与女性主义哲学思潮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践具有一致的阶段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人类社会“政治运动-思想观念-文化载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的反应，是特定历史阶段政治/文化观念交互作用和权力/制度力量博弈的产物，而力量的失衡总是肇始于现行制度与社会发展的不配搭，平衡于对利益群体的人性关怀。因而，制度的总是阶段性地领跑文化的进步，人性的才是跑道延伸的方向标。

注释：

① 在3次妇女解放浪潮中，先后涌现和分化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有色人种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不同的流派。

② 马丁娜·厄斯特贝格(Martina Bergman-Österberg)，瑞典人，1879—1881年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中央体操学院学习，在伦敦成立并领导女体育教师培训学院，后被伦敦教育局任命为女子与幼儿学校体育锻炼女学监。培养了1300多名体育教师，教授瑞典体操、解剖学和生理学，并在300多所学校引进了学校体育。1885年创立汉普斯特德女子体育和体操学院。

③ 肯考迪娅·勒夫温(Concordia Löfving)，瑞典人，毕业于瑞典皇家中央体操学院，是在英国教授妇女体操的第一人。

④ 性/社会性别制度是通过一套安排把生物学意义上的性转变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父权制社会采用男性和女性生理学上的某些事实(染色体、人体结构、荷尔蒙)

作为基础,建构出一套“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身份与行为。

⑤ 随着女性主义思想中所谓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出现,激进女性主义群体分化为两个阵营: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者(radical-libertarian feminists)和激进文化派女性主义者(radical-cultural feminists)。

⑥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赋予自然一种女性身份。将妇女的生育力和生理周期与大自然的农业多产性和季节周期性相比较,将妇女维持家庭的生计与生存与大自然的可持续性相比较。

⑦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尝试削弱自然与女性的联系,不再强调其重要性。将妇女与自然之间、男性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看作是女性从属于男性,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剥削的根源;是一种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承认自然与文化、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一定要优于另一种。主张女性更接近自然的观点是幼稚的,把妇女束缚在她们的生物学命运上,会妨碍女性的解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最初的激情。

⑧ 发达的西方白人女性也许不必考虑生存问题,但是作为家庭照顾者的第三世界妇女更加依赖土地、水和森林资源。环境的恶化会加重她们的家务劳动负担。将这些资源从她们的掌握和控制中拿走,会毁掉女性的生产和生计活动,同时也毁掉了资源。

⑨ 生态女性主义认识到对女性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即父权中心体制是导致“宰制女性”和“宰制自然”的根源;强调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了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是一种后现代女性主义。

参考文献:

- [1] 安妮塔·L·德弗兰茨. 妇女在奥运会中作用的变化[J]. 体育文史, 1997(1): 46.
- [2] 利奇德. 古希腊风物史[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99.
- [3] 赵玉, 陈炎. 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女性: 告别沉默的“他者”[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8, 45(4): 60.
- [4] K吐依, AJ维尔. 真实的奥运会[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01.
- [5] SUSAN W. A(qualified) defense of liberal femi-

nism[J]. Hypatia, 1987, 2(2): 66.

[6] ALISON M J.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M]. N J: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88: 33.

[7] MICHAEL J S. Liberalism and its critic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4.

[8] MARY W.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moral and political subjects[M]. New York: WWNorton, 1975.

[9]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 艾晓明, 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0] IMMANUEL KANT.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M]. H·J·Paton, Translate.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58.

[11] 汪伟信, 胡安琪. 女性进入奥运会的历史进程[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1999, 15(3): 6.

[12] 沃尔夫冈·贝林格. 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M]. 丁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3] CHARLES L. What a freak-show they made! Women's Rugby League in 1920s Sydney[J]. Football Studies, 2001, 4(2): 25-40.

[14] BESSIE R P. Remarks on the education of girls[M]. London: John Chapman, 1854: 36.

[15] ALICE E. The new feminism of Yin and Yang[G]//ANN S, CHRISTINE S, SHARON T.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445.

[16] JEAN B E. Public man/private woman[M].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226.

[17] 沈双喜. 裸体训练——提高运动成绩的捷径[J]. 体育世界, 1994(2): 23.

[18] 贝尔德·凡妮莎. 性别多样化: 彩绘性别光谱[M]. 江明亲, 译. 台北: 书林出版社, 2003.

[19] LORRAINE D. The nature of na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J]. Configurations, 1998, 6(2): 149-172.

[20] GEORGE SESSIONS.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a review[J]. Environmental Review, 1987(9): 115.

[21] FERRY. The new ecological orde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nd): 118.

[22] YNESTRA KING.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inism of ecology[G]//JUDITH P.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Philadelphia: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9: 23.